



毛泽东诗词频繁运用动物形象，有飞禽、走兽、鱼鳖、昆虫，还有神话动物，借以彰显斗志，舒展胸襟，宣泄气愤，抒发意气。认真解析这些动物意象，有助于品味毛泽东诗词的意境，领略毛泽东思维的广博，把握毛泽东心志的高远。

云横九派浮黄鹤

毛泽东诗词常用动物作为衬托，营造诗歌意境。“云开衡岳积阴止，天马凤凰春树里”，“天马凤凰”指岳麓山东南的天马峰、凤凰峰，又赋以山形峰影在“春树里”腾空展翅之势。“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”，晴空万里，雄鹰高飞；湘江清澈，鱼儿嬉戏，“翔”字把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写得活灵活现，使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变得生动具体。“若问杭州何处好，此中听得野莺啼”，五云山林峦蔚起，毛泽东忙里偷闲，闻听野莺鸣唱，这是自然美的颂歌，也是内心的惬意之曲。“飞凤亭边树，桃花岭上风”，杭州北高峰上的飞凤亭，犹如飞凤。“一片飘颻下，欢迎有晚鹰”，树叶片片飘落，晚鹰欢迎游人归还，亦是游人欢迎晚鹰，“我”和“鹰”融为一体。“云横九派浮黄鹤”壮写长江烟云浩渺，虚实结合，委婉含蓄。“黄鹤”，一说指黄鹤楼；一说指崔颢《黄鹤楼》的“黄鹤”，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“黄鹤知何去”中“黄鹤”即为此意；一说代指武汉三镇，因“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”名句，武汉三镇有“白云黄鹤的地方”之谓。“到处莺歌燕舞”，颇似苏轼《披锦亭》“燕舞莺啼春日长”，把井冈山“新颜”写得有声有色，春意盎然。

毛泽东笔下的“雁”字极具感情色彩。“衡阳雁声彻”，同贸易关隘是衡阳县人，衡阳雁飞远去，挚友不幸病逝，“去去思君深，思君君不来”，毛泽东极度愁苦。“长空雁叫霜晨月”，寒霜满地，晨月西斜，大雁鸣叫，意寓红军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。而“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”，与王维



汪建新

毛泽东诗词中的鸟兽鱼虫

《寄荊州張丞相》“目盡南飛雁，何由寄一言”如出一轍，寄寓了無限情思。越過六盤山，長征勝利在望，毛澤東伫立山頂，極目凝望大雁南飛，緬懷長征一路犧牲的烈士，思念留守根據地的親人戰友，牽掛中央蘇區的父老鄉宗。

鲲鹏展翅九万里

“独坐池塘如虎踞”，青蛙像老虎独霸池塘，养精蓄锐，傲视群伦。“金猴奋起千钧棒”，孙悟空疾恶如仇，不断降妖除魔。“虎踞龙盘今胜昔”，钟山像龙一样盘绕，石城像虎一样蹲踞，形容南京地势险要。但在“忽报人间曾伏虎”“独有英雄驱虎豹”中，“虎”指十恶不赦的反动势力，即毛泽东所藐视的“纸老虎”。

毛泽东诗词纵横捭阖、气势恢宏，这得益于庄子对他的深刻影响。庄子是浪漫主义的鼻祖，以寓言讲哲学，李白《大鹏赋》称赞他“吐峥嵘之高论，开浩荡之奇言”。少年毛泽东写过《赞鹏》，“只喝井里水，永远养

不长”，表达对私塾教育封闭刻板的不满，与庄子《庄子·秋水》“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虚也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庄子读过志怪书籍《齐谐》，鲲鹏从北往南飞，“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”《庄子·逍遥游》塑造了鲲鹏：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”毛泽东诗词当中，多次出现鲲鹏意象：“鲲鹏击浪从兹始”“到中流击水”“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”“斥鷃每闻欺大鸟”“鲲鹏展翅，九万里，翻动扶摇羊角”。除“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”中意指恶魔，具体指国民党反动派，属于贬义外，其他的鲲鹏形象都是褒义，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青年才俊，搏击风浪的热血男儿，经邦济世的治国栋梁，反修反霸的英勇斗士。毛泽东参悟庄子精神，蔑视“我要飞跃”的“蓬间雀”，他以鲲鹏自喻或喻人，营创出宏大壮阔、厚重渊浩的宇宙气象。鲲鹏俨然就是毛泽东的人格化身，正因为如此，他的胸襟才会如此雄浑、博大。

铁马从容杀敌回

骏马曾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，战时又是重要的作战装备，毛泽东对马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“关山蹇蹇足”，关山即关隘，《木兰诗》有“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”，“蹇”，跛也，困苦、不顺，“蹇足”，代指千里马，毛泽东慨叹好友易昌陶未及建功立业便英年早逝。“万马齐喑叫一声”，龚自珍有诗句“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”，毛泽东称赞“中唐俊伟”刘蕡敢于针砭时弊，冒死进谏。“梁王堕马寻常事”是意外事故，表达对“少年倜傥廊庙才”贾谊的同情。

毛泽东戎马倥偬，是“马背”诗人，讴歌战马方显英雄本色。“马蹄声碎”，马蹄声急促杂乱，表明娄山关一带高低不平，也反映出红军行军争先恐后的急迫心理。“山，快马加鞭未下鞍”，山势险峻，红军马不停蹄，扬鞭策马飞驰而过，凸现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的豪气。“奔腾急，万马战犹酣”，用万马奔腾激战比喻山绵延起伏，把静态的山峦写得动感十足，神采飞扬。“谁敢横刀立马？”表达对英勇善战的彭大将军的赞赏和倚重。“征马嘶北风”，战马不畏严寒，迎风长啸，象征人民军队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。“人山纷赞阵容阔，铁马从容杀敌回”，视角独特，化用陆游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》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。一般人观钱塘潮，不外乎惊叹潮水的阵势阔大，而毛泽东由观潮联想到雄师劲旅的“十万军声”，排山倒海，摧枯拉朽。“立马曾挥北地鞭”，回想在北方征战的戎马生涯，晚年毛泽东“犹记当时烽火里，九死一生如昨”，可谓“忆往昔，峥嵘岁月稠”。

扫除一切害人虫

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第一篇是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，文章第一句话开门见山：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毛泽东立场坚定、爱憎分明，他褒扬或者贬义什么动物，既看动物本身的特性，也取决于他想要表

长征路上父亲与奶奶的三次相遇

李 洋

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奋斗图存精神的升华。“长征中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？红军战士靠的是是什么？图的是什么呢？”习近平总书记的三问，发人深省。

“长征前红军三十万人，到陕北不到三万人。”要奋斗就会有牺牲。在长征途中，红军经历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，血染湘江、四渡赤水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、过雪山草地，许多战士倒下去了……我父亲一家九口当红军，五口人牺牲在长征路上。长征中，牺牲的烈士不计其数，许多连姓名都没有留下。成千上万的先烈，为了人民的利益，前赴后继地英勇牺牲了。

红军战士图的是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。我的爷爷、奶奶就是因为对共产党的热爱，对红军的热爱，走上了长征的革命道路。我的爷爷李惠荣为掩护红军通讯员光荣牺牲。父亲李中权这样记录了我奶奶王礼诗：“开始长征那年，母亲已经是53岁了，从小裹脚就这样，她挪动着小脚拽着弟弟妹妹，夹在奔波的红军家属和部分根据地区群众中，从川东走到川西，两条腿肿胀得像个紫萝卜，左小腹还长了一个毒疮。她带着伤病，仍过了嘉陵江、涪江、渠江和岷江、翻雪山，在一年零三个月里，一步步走过了近两万里。”

我父亲李中权在长征路上，三次遇见我的奶奶王礼诗。我父亲回忆说：第一次遇见母亲是1934年4月；第二次遇到母亲，是1936年3月。母亲深明大义，相信自己的路走对了，再三叮嘱我要全力搞好工作，不可为她们分心。面对这样坚强的母亲，原先搜肠刮肚想好的几句宽慰话，早已被泪水所淹没。

最后一次见母亲是1936年6月，在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时。那时已担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独立二师政委的我，正在行军路上。我与母亲都心照不宣，时下的条件，很难为她解决任何问题，此次一别恐难再见。看我万分为难，通讯员说：“李政委、伯母，要不，把她留下照顾伯母吧！”通讯

员的这个主意，真使我有些动心了。“不成，北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！”母亲叫中柏弟弟挽着她，走到我的面前，训斥般地说：“你甭想歪点子了，我能走，两年都过来了，还愁走不到陕北？”母亲说着把中衡弟弟和中秋妹妹拉到身边，亲切地说：“我们到陕北找毛主席去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中衡、中秋异口同声地回答，母亲微微地笑了。母亲的微笑丝毫解除不了我内心的忧虑。望着她憔悴多病的身体与幼小的弟弟妹妹，联想到今后她们将面对的严峻征程和可怕处境，我内心难过得犹如刀割。我不忍心留下重病缠身的母亲和年少的弟妹不管，但红军独立师更不能缺少政委。

“李政委，队伍都过去了。”通讯员再次报告说。他的意思我清楚，我们必须走了。“快走吧，别误了大事呀。”母亲的话音有些颤抖。“娘，我走了。”我向母亲辞行，母亲没有提出任何要求，也没有说话。她两眼满含泪水，久久凝望着我。我还能母亲做些什么呢？我摸摸口袋，盐巴、银元都没有了。就在我转身的时候，一眼望见了我的那匹战马，心里不由一阵欢喜。我牵过那匹马，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。深情地说：“弟弟，多照顾一下娘，多劳你了。”我朝母亲和弟弟、妹妹看了最后一眼，含泪而去，不忍回头再看。然后和警卫员一道跨上战马上征途，继续向着北方方向着陕北奔去。

母亲和弟妹们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战马的帮助，翻过了雪山。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，母亲再也走不动了。她拔下头上的簪子扎破了腹部的毒疮，黑黄的脓水直往外冒。1936年7月7日，我的母亲倒在了长征的路上。临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她叮嘱说：“跟着红军走！”

让人欣慰的是，我们四兄妹终于完成了长征，胜利到达了陕北，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，从此我们把党当爹娘。

迟浩田上将为《李中权征程记》

题写：“满门革命赤子，辉煌永留青史”，为这个光荣家庭作出评价。我的父亲参加了长征、记录了长征，经历了雪山草地的生死离别。父亲冒着枪林弹雨，浴血奋战，经受了长征的淬炼、战火的淬炼，他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。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，不怕流血牺牲，勇往直前。

“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，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”去年，我和几位红军后代一起去了父辈们长征走过的地方，我们平均年龄66岁，驱车驶向川陕革命老区，重走红军长征路。尽管现代人享受着物质的丰富，交通的便捷，环境的改善，但天气的变化，活动的身心投入、体力的消耗，此行我们也会有身体的不适，也出现了高原反应。每当我们感到身体不舒服，感到有点累的时候，就更加为红军感动，红军在那样艰苦的岁月，是在挑战生命的极限。他们个个都是钢铁汉，红军是英雄的群体，红军长征时间长、规模大、行程远、环境险恶、战斗惨烈，长征是一首悲壮的史诗，是一首英雄的赞歌，是一个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。

四川正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险恶的路段之一，当你真正走上长征路，才真正感受到长征的艰辛与伟大，才能认识长征路上的苦难与辉煌，我们领略前辈风范，聚焦长征精神，了解先辈革命事迹，对红军、对先烈充满了崇敬与感恩，红军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，我们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。我们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必须好好珍惜。作为红军后代，更应该好好传承红色文化，弘扬红军的长征精神。

（作者系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会长，老红军、开国将军李中权之子）



文学的期许

阎晶明

新中国成立70多年了。新中国70多年社会生活的多种侧面，历史发展的跌宕起伏，人间世相的千姿百态，人们情感的喜怒哀乐，林林总总，都体现、呈现、表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。把一部作品融入一段历史当中，契合于国家、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思潮涌动当中，揭示一种家国情怀，提炼作品的社会价值，这些都是总结中国文学艺术过程当中的重要主题和理论自觉。

放眼当今文坛，一种令人值得期待的文学前景正在向我们展开。作家创作更自觉地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，展现个人命运与表现时代精神的关系，在思想上进一步向深入开掘，在故事性上拓宽延展，在艺术性上努力提升，涌现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文学作品将成为一种良好态势。

从美学追求上观察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合正在形成一种趋势，未来也必将成为作家创作的共同追求。

回顾新中国70多年的文学发展历程，现实主义无疑具有最强劲的生命力。随着社会不断开放，文化交融不断增强，社会公众的审美水平不断提升，更因为传媒手段渠道的日新月异，人们的审美方式和艺术接受选择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，现实主义的疆域不断拓展。在当代中国，现实主义的概念曾被加设过太多的限定，这些限定并非是确定的文学概念，但它们表达了作家和批评家在创作与研究当中的最新思

考以及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。与此同时，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创作潮流，与开放的中国文学产生了越来越多、越来越频繁密集的碰撞。探索、实验、新潮、先锋，曾经怎样剧烈地、激昂地、鲜活地融入一段历史当中，契合于国家、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思潮涌动当中，揭示一种家国情怀，提炼作品的社会价值，这些都是总结中国文学艺术过程当中的重要主题和理论自觉。

当然我们也应看到，长期以来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似乎成为两种文学力量，甚至形成两种文学观念，维护着两类文学的接受者。情形正在改变，简而言之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忠实于生活和现代性表达，展现时代风貌与写出精神世界之间正在形成融合。从前的双峰并置，如今体现在一个作家身上，一部作品当中，这种融合，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文学的潮流。中国作家的这种艺术自觉，也是开放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的标志。

还有一点，即从前井水不犯河水的两种文学，以今天的站位回看，正在达成互相理解，并从中寻找出被疏漏的艺术品质，也成为一种趋势。从前的先锋文学代表作家纷纷转向表现现实，又同时自觉保留着自己的先锋品质。过去被认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，其作品的

艺术品质被重新评说，得出新的结论。如对路遥小说艺术性的重估，对柳青《创业史》艺术品质的重新评价，以及对赵树理、孙犁等作家创作的经典性价值研究，等等。

就此而言，中国文学前景特别值得期许。网络文学活力频现，成为向影视艺术提供原创作品的显著力量。作家创作的艺术自觉在思想性和艺术性、主题深度和生动表达方面的追求更高也更综合。现实主义道路必将更加宽广，就因为现代性的文学理念、创作手法、艺术技巧的纯熟运用，具有艺术探索自觉追求的作品描绘、表现着我们正身处其中的时代生活。站在今天这样一个融合的时代，我们既要重新评价以往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，同时还要记住先锋文学、探索小说、朦胧诗，等等，为开掘中国文学道路所作出的独特贡献，这种贡献不可替代。我们相信，无论面临怎样的时代变化，文学都应当、也能够发挥先行者的作用，在文化生活、艺术传播、审美观念发生不断变化的过程中，仍然保持自己是一切艺术之母体的地位和不变的从容风姿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）

